

【信息导刊】

书评特刊

(网络版)

思想

- 《米洛万·吉拉斯德政治思想演变研究》……………2
《每个人的政治》……………3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4
《例外的挑战
——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年）》……………5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6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7

历史新声

- 《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8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9
《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10
《争洋霸海》……………11

国家生活

- 《论中国》……………12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13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14
《文明·国家·大学》……………15
《大拐点》……………16
《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17

文学

- 《酒国》……………18
《奇迹集》……………19
《甘南纪事》……………20
《刘氏女》……………21

总 第 56 期

主办：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本期主编：张宝玉 高祥永

责任编辑：李宏宇

韩凤伟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

蒲昌路 18 号

邮编：110136

电话：(024) 31975939

(024) 31975953

Email: tsgxxb@sie.edu.cn

网址: www.lib.sie.edu.cn

南书房·书斋里的 2012

这些书多半是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它们要么解释着是什么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要么在努力地告诉我们那些正在发生着的未来。

摘自《南风窗》，已在图书馆《书评》专栏中分两期刊出，今转载《信息导刊》（书评特刊），供读者阅览参考。20 本书，我们将归纳为四类：

思想——

- ①《米洛万·吉拉斯德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 ②《每个人的政治》
- ③《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 ④《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 年）》
- ⑤《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 ⑥《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历史新声——

- ⑦《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 ⑧《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 ⑨《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
- ⑩《争洋霸海》

国家生活——

- ①《论中国》
- ②《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 ③《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 ④《文明·国家·大学》
- ⑤《大拐点》
- ⑥《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

文学——

- ⑦《酒国》
- ⑧《奇迹集》
- ⑨《甘南纪事》
- ⑩《刘氏女》

①

被遗忘的米洛万·吉拉斯

文/项佐涛



吉拉斯对于中国大多数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世界范围内，吉拉斯却是与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甚至更早时候的托洛茨基齐名的人物，他是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中国读者对吉拉斯知之甚少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没有建树，而是他的观点过于激进，长久以来被中国学术界有意回避了。

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造者、男子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国民议会主席，甚至被认为可能会成为铁托的接班人。然而，1954年，由于提倡“加速南共联盟消亡”的改革观点，吉拉斯被南共联盟罢黜了所有官位，逐渐成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1957年，吉拉斯在美国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新阶级》一书。在书中，吉拉斯提出了在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的观点，从而迅速在冷战双方引起了巨大反响。截至20世纪90年代《新阶级》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发行300万册，被《纽约时报》列入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

与提出苏东国家内部的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说法的托洛茨基相比，吉拉斯的批判更为激烈，他将这个群体称之为“新阶级”。“阶级”与“阶层”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着质的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社会中社会制度的变迁是通过阶级关系的变动表现出来，一个占统治地位“新阶级”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社会制度产生。历史地看，是“新阶级论”和“特权阶层”构建了苏东持不同政见者批判苏东国家官僚化现象的理论基础。

在冷战年代，吉拉斯的观点极易被用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学者不同，2012年刚刚出版的《米洛万·吉拉斯德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一书试图通过翔实材料呈现一个真实的吉拉斯——尽管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却仍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作者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方面，他的批判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社会分析方法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吉拉斯提出的理想社会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以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公平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模式。这两点，正是吉拉斯有别于以哈维尔为代表的西方派持不同政见者和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民族派持不同政见者的地方。

在苏东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正当权力来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的社会发展方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快速推动了生产力，却造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异化的官僚制度，从而形成了苏东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两个基本矛盾：即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与官僚管理的无能之间的矛盾，现代化成果合理分配的客观需要与官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之间的矛盾。最终，苏联模式在促进苏东国家现代化方面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并走向瓦解。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特权官僚集团把苏东社会主义制度送上了断头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与苏联模式有很大不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吉拉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问题，即如何避免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而导致官员的腐败现象、特权现象，乃至产生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或者“新阶级”，仍旧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时刻应该警醒的问题。

《米洛万·吉拉斯德政治思想演变研究》
项佐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 8 月版

②

对政治思想的消毒

文/石勇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他的“光”就是“思想”。

笛卡尔怀疑，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否作为一种幻觉？休莫怀疑，从“是什么”，我们根本无法说出“应该什么”。而赵汀阳则怀疑，我们对“生活世界”的很多理解，或者是不完备的，或者从基础上来说就是错的。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少有的可以用“哲学家”或“思想家”来界定的学者。他极具原创性和思想性冲击力的著作，诸如《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天下体系》，总是刺激起学术界探讨的兴趣，以及思想青年们的神往。

每个人的政治

赵汀阳 著



年们的神往。

《每个人的政治》这本书是他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和界定这个“残酷问题”思考的结晶。8 篇长文支撑起了他对“各种看上去很美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审视、追问，以及“我们该怎么想？”的提出。

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的政治学转向”尤其符合社会转型的需要和大众的胃口，因为权力的不受约束和大众的被剥夺，始终是一个痛点。而这种社会需要，被庸俗化成了各种口号，造就出大批进行政治消费的公知。与之相应，各种似乎旨在对抗权力的价值，也被“宗教教化”——用赵汀阳的话说，“思想”已死，只剩下了“思想的遗产”：盲目观念。盲目观念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人们心理需要的一种治疗。

《每个人的政治》非常接地气，多篇文章切入中国社会严峻命题，诸如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论。支撑赵汀阳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是他的“预付人权”理论。

“预付人权”理论远非一个哲学家赶新潮制造概念，而是瞄准了“天赋人权”的一个大漏洞：假定 A、B 都具有不可被剥夺的天赋人权，但 A 残忍地杀死了无辜的 B，于是，按照天赋人权的理论，不应该对 A 判处死刑，因为法律“杀人”是错误的，是在 A 杀死 B 后错上加错——但是，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法律重视 A 的人权，更甚于重视 B 的人权，预设了 A 相对于 B 具有“生命特权”。

就是说，“天赋人权”理论具有自败性：从捍卫人权的逻辑原点出发，最终在对人的人权不平等对待中挫败自身。它并没有看到受害者的人权，以及他的家属所遭受到的痛苦。这是一个可怕的伪善。赵汀阳把它界定成“一个糟糕的生存游戏”，鼓励坏人去破坏更多人的人权。

事实上，在类似于药家鑫事件上，逻辑上根本无法为凶手的免死辩护——一个人如何在残忍地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时，正当地认为自己可以不死？如果还承认人与人的人权是平等的，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要免死，是在逻辑之外的，诸如整个社会的宽容超越了正义的直观，比如别的惩罚形式能够有效代替死刑并得到了人们通过法律修改来表达的集体

认同。

赵汀阳有一个特点，对很多重大问题的阐述，既具有独立性，同时又和别的重大问题相关。“预付人权”理论就和他为“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一个存在论基础，即“共在存在论”相关。他的观点是：共在先于存在，在共在状态中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如此一来，人权有了一个存在论基础，而“共在”，更是在思想上回答了关于爱情、友谊、信任、相互理解、博弈、合作、政治和社会游戏规则的选择等今天中国最让人头疼的问题。

听一听哲学家怎么说是有好处的。

《每个人的政治》

赵汀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8 月出版

③

追问政治秩序的起源

文/张天潘



在 1992 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一人》一书中，日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历史不会再以更高形态出现了，进步发展的历史就此终结。这种对未来的充分乐观的判断，成为轰动一时的宏论。很显然，这样的论断，是受到了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人类事件的影响，各种迹象都在宣示着人类走向“自由民主”的共同原则，其成为这个地球上终极的政治模式，成为普遍的选择。

因此，在未来社会形态进化已经走到头的情况下，一个政治学者还能做什么呢？福山显然没有停止思考，在未来的历史终结之后，他转向了历史，开始向后转研究起了政治秩序的起源问题，结合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将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了人类的灵长目祖先、部落社会，以及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政治形态演化。于是就有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这其实只是福山研究政治秩序起源的第一卷，关注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前夕的历史时段。他说“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在第二卷，他才开始正式关注近现代的政治秩序演化，也即解说现当代政治发展，如果说第一卷是在研究人类政治秩序的总体性的上升演化过程，那么第二卷更多地关切到了当代政治的各种处境，比如政治焦虑、政治衰败（包括制度僵化与家族制复辟）、暴力和功能失调、无政府幻想等。

不过现在我们就事论事专谈第一卷。正如福山说，人类的制度很“黏糊”。这是指，它们长期延续，只是经受了重大的艰辛，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那么，现代政治秩序，应该如何才能成为稳定的秩序？他认为，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就是把“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这 3 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一方面，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但是他又提醒，虽然“国家、法治、负责任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但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而且也不是同时进行的，出现了其中一个，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比如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成长，法治却在印度和中东开始，而负责政府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才在欧洲发展起来，但印度、中东却没有像欧洲一样，建成一个 3 种制度同时存在且结合得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

当然，福山并没有就此停止，他在他的老师亨廷顿的基础上，将以上的三个维度（这是政治层面的）加上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性（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两个维度之后，还加上了“第六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正统性的维度（体现为宗教、意识形态等）。这个模式，在第一卷中没有详细描述，我们期待在第二卷中，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深邃分析与思考。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版

④

危险的施米特

文/田磊



过去的几年，卡尔·施米特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类学术著作中。阅读和解释施米特成了中文学术界的一个时尚。这个纳粹党员、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在他身后所引起的研究热潮，似乎终于开始波及中国，经由专业的学术小圈子，逐步进入到大众视野。

施米特的生平并不复杂，他出生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小镇，1985 年以 95 岁高龄又在那里去世。在德国的魏玛时代，他是《凡尔赛合约》和《魏玛宪法》的激烈批评者，1933 年，身为科隆大学法学教授的他加入纳粹党，从那以后，他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为希特勒服务，被授予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二战结束后，他受到审判，却从不为自己与纳粹的合作表示后悔，而是继续著书立说，宣扬和发展自己那些激进的思想。

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人，在他去世后，其思想反倒迎来了更大的研究热潮，在英语世界，这股热潮已经持续了近 30 年。在这中间，去年被翻译成中文的《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 年）》有着特别的价值。其作者乔治·施瓦布是美国战后第一个系统研究施米特思想的学者。

这本书原是施瓦布在 1968 年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提交的一篇论文，但在那个年代，研究施米特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学者是一件多么政治不正确的事，所以，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多年以后，其价值才广为人知，本书简洁的篇幅以及编年体的叙述方式，都为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提供了极大便利。

作者与施米特本人有过漫长的交流，他按时间顺序，将施米特和他的思想放回到魏玛和纳粹时代，尽最大可能去理解他种种论述的根源。施米特那些激愤的思想早已为世人所知，他仇视自由主义，推崇国家主义，对议会制度失望，他将政治定义为生存意义上生死

存亡的敌我冲突，终其一生与这个“自诩为资本主义、机械主义、相对主义时代，交通、技术和管理的时代”做斗争。他认为，一个社会完全由市场导向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群组成是危险的，自由主义消解了政治，没有能力激活那种能唤起忠诚的公共领域的概念，而这种忠诚才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基础。所以，他预言说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立场使得自由主义国家天生孱弱并难免被征服的厄运。

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转型中，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与欧美世界截然不同。其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总量、性质还是复杂程度，都是另外一番景象。正因为此，像施米特这类在过往被忽略的思想资源，重新纳入我们的视野，应当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比如，他对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就有过异常丰富的论述和深刻的洞察，其视野也与过往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迥然不同，而这也正是困扰今日中国的一个重大难题。无论他最终开出的药方是否荒谬，他的思维方式都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只有在吸纳日益丰富的思想资源基础上，才有可能为这个复杂性急剧提高的中国和世界开出有价值的药方。

《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年）》

【美】乔治·施瓦布 著 李培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版

⑤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文/石勇



1949年，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以及另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和即将建立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爱因斯坦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那是在“社会主义”具有魅力的时代，一个科学家对于它的憧憬式想象。但在20多年前，“社会主义”却面临着低潮和挑战。历史当然并没有像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那样已经“终结”，定格在资本主义的一统江湖中，但事实是：作为制度安排和社会理想，它的感召力亟需提升。

如果一种社会理想，被视为“铁的规律”，必然要来，但历史的发展恰恰又表明它来了又去时，要说服人们去相信它是一个归宿，逻辑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似乎要换一个思路——那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辩护，转到对它提供一个正当性的道德基础上来。换言之，以政治哲学的思考方式来进行论证。

在爱因斯坦发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60年后，加拿大政治学家科恩写了一本小书《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完成了这一工作，虽然，他对社会主义的辩护是否成功，要接受人们的检验。

在社会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科恩被认为是一个在理论上扭转乾坤的人物。正是他，通过政治哲学的方式，让在理论上僵死的社会主义焕发了生命力，并摆脱了它在西方政治哲学争论中极为边缘的地位。就此而言，政治哲学家们在对一种制度安排和社会理想进行论证时，也许可以在仔细考察后给予拒绝，但已无法先验地排除“社会主义”这一选项。

科恩，“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重要思想家，父母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在那种家庭氛围中长大，深深受到感染，一生都没有抛弃。像无数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各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种政治事件中受到打击。不过对他打击最深的却是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的一本书《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是一本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得出了相反结论的书，对科恩的信仰，在理性上构成了极大的杀伤力。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宗教，你不能强迫自己相信“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而是必须给自己的信仰找出无法被驳倒的理由。

几十年中，它成就了科恩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这本书。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 21 世纪初最精彩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通俗易懂，思路清晰。而政治哲学的论证，最典型的一个路数，不是显得多么高深、专业，而是尽力去吻合我们的道德直觉，澄清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种理念，或是拒绝它。

科恩所用的是一个“野营旅行”的例子。他试图论证，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都会选择社会主义的那些原则，比如平等和共享，就是说，在道德上，社会主义是可欲的，比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但它可行吗？它的解释力，能超出野营旅行本身而上升到关于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的设计吗？科恩对此进行了讨论。

对于科恩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可欲、可行”性的论证是否成功，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它要求我们有一种理性上的诚实。检验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无论它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而这，恰恰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一种制度，一个社会最为稀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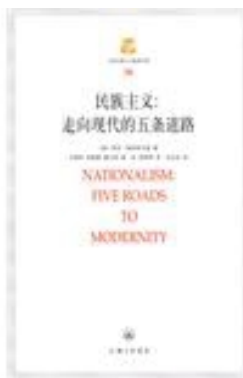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

【加拿大】G·A·科恩 著 段忠桥译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3 月

⑥

民族主义的历史与价值

文/田磊



民族主义以其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一直都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大课题。而近年来，中文世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热情自然更有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民族整体崛起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有了越来越强的统合能力，这与历史上那些大国崛起的进程也是类似的，作为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每当现有的政治正当性出现衰微，民族主义总会被拿来使用，屡试不爽，却也为其带来了不少恶名。

与其他同类学术著作稍有不同，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淡化价值批判，而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分别梳理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以及美利坚五个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主宰了人类进程的民族进化史。

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总称的概念，更多的是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层面的内涵，显然与我们惯常意义上使用的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不相干。她将民族主义分为三种，个人主义——公民型、集体主义——公民型、集体主义——种族型。原初的现代民族观念出现于 16 世纪的英格兰，在那里发展出的个体主义公民型的民族主义先是在法兰西和俄罗斯出现，随后在 18 世纪末期出现于德意志诸邦，法兰西的民族主义是中间状态的集体主义——公民型，而俄罗斯的族裔民族主义之纯粹堪为楷模。

书中更引人入胜的是覆盖在这些历史骨架上的活生生的血肉。纷杂的历史经过作者的梳理，其洞见对于今天的中华文明复兴依旧有参照价值，比如，对于引进民族观念并极力阐释各自民族意识的后发国家来说，“怨恨的创造力”在于它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一方面，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无足轻重、外在的，甚至是在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本土传统中与引入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刻意栽培。

在德意志和俄罗斯的民族进程中，怨恨就成了决定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发育的最主要因素。这样的历史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也是不会陌生的，直到今天，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公共议题的论争。就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俄国贵族杰尼斯·冯维辛追问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纠正两种相互对立而又有害的偏见：第一，我们的一切都糟糕透顶，而外国土地上一切都是好的；第二，外国土地上一切都糟糕透顶，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

格林菲尔德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其起源就规定了其性质，张扬某些传统，而抑制另外一些传统。所以，知道了一个具体民族主义的性质，就能预料这个民族会有哪些类型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最终能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却不是完全可预测的。在这本书的中译本中，格林菲尔德写了一篇充满善意的前言：伟大的亚洲文明将崛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文明崛起，从而结束历史上的“欧洲时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希望你们能够友好地对待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民族，真有这样的际遇和能力吗？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王春花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 1 月版

⑦

霸业兴衰之根本

文/禾刀



盛极而衰，这是历史的周期律？未必，至少历史学家许倬云不这么认为。就此问题，在《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一书中，他以“康乾盛世”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历年征战掏空国力，更由于“八旗子弟”养尊处优，清朝核心决策机制难以引入更为先进的民间思想，所以乾隆面对带来西方工业文明信息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闭目塞听，夜郎自大，既错失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发展良机，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苦涩的伏笔。

本书中，许倬云以系统论之法，从秦汉帝国开始，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中国历代王朝组织架构的分散聚合对其存续的影响，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大脉络；世界史方面，则重点分析了罗马帝国的成败因缘，并由此而下将其与近代列强如荷兰、大英帝国等比较异同，最后反思了今日美国基督教精神丧失的原因。

在许倬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朝代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不能是固定的，“必须维持一定的弹性，自我调节的弹性”。打破系统平衡的因素涵盖各个方面，既有皇帝的生老病死

死，也有战争；既有经济发展问题，也有“五胡乱华”的影响。“弹性的价值在于，可以顺应时势不断革新，形成新的平衡”。

许倬云的关注面极广，但本书笔墨更多倾注于解读朝代更替的机制问题。许多朝代之所以开国之初能够迅速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实现较快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管理层真正来自于五湖四海。而随着江山的稳定，官僚机制日益走向封闭，人才选拔圈子不再是真正基于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如何捍卫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

虽然科举制度有助于吸纳社会优秀人才，但相较于既得利益阶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互佑，通过科举考试等少数通道吸纳的新人往往因为势单力薄，其进入官僚体系更像是一次“入赘”：要么因为自己的“洁癖”而被迅速排斥在传统势力圈子之外，要么迅速被传统圈子同化，进而失去改造机制的动力。当一个系统只能因循守旧，实际上已预示它开始迈入淘汰的通道。许倬云对此现象的点评直接而又深刻，“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

公权力的开放，意味着其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不禁令人想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历史教授西蒙·夏马在《美国的未来：从开国元勋到巴拉克·奥巴马德美国史》中的分析。通过对美国 237 年简短历史的梳理分析后，作者得出结论。美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至今天问鼎世界头号强国，实际是一条“限权”之路，即对公权的规范与约束。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历史也不难发现，之所以过往朝代的更替不可避免，归根结底就是，“公权”的公信力大多只是寄望于皇帝的开明和自觉，缺乏坚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力量。当外在条件逐一发生变化时，国家这个系统的机能却无法及时地作出有效更新，最终只能破坏性地打破原有平衡。从这层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能否不断发展进步，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具备与时俱进的改革潜能，当然，这种改革须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或者经济层面。

《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许倬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年 4 月版

⑧

一部社会运动的圣经

文/谢奕秋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乍看是部 1968 年编年史：“那一年越南发动了春季攻势；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遭到暗杀；苏联将坦克开进布拉格；墨西哥政府在夏季奥运会前夕大开杀戒；巴黎学生在城市的围墙上到处涂鸦”……但对资本主义多有保留的马克·科兰斯基，所着力呈现的，却是从纽约、迈阿密、伯克利、芝加哥到墨西哥城、罗马、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直至东京的骚乱、动荡和反叛的全景，以及这些反叛运动背后的精神密码。

“1968 一代”拒斥一切权威，在民权运动示范和越战日益可憎的环境中，他们找到了叛逆的理由，并趁电视尚未被控制和包装到如今地步时，学会了利用电视。在 1968 年的革命神话退色后，还有许多人、反叛精神和组织方式，

值得我们今天纪念、收藏和发掘。

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这个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在教堂举行婚礼的领导人，在仓促掌权后容许了布拉格没有审查的印刷业，又在数月后用“宁入狱不辞职”的决绝给五国 6000 辆坦克进驻的合法性戳上流血不止的伤口。他的同事，以往总是首先向莫斯科示忠的老将军斯沃博达，在苏联人恐吓其必须签署同意政权更迭的文件时，以宁可自杀相回击。布拉格之春最终湮没，但铁幕后一代人的反抗勇气，给后来的哈维尔以坚持不屈的灵感。

再如波兰的自由派。《政治》周刊常以反说方式揭示事实，如果一个学生抗议，它会说那个学生已经撤回了抗议信，很有可能还会列举他在信中所撒的谎，这样波兰读者就会知道有一封抗议信甚至还能知晓其中一些内容。该刊的编辑拉科夫斯基后来成了波共最后一任书记。波兰政府对电台进行干扰，这反而成为一种信号：熟悉的隆隆声意味着这个节目重要，仔细听还是能辨出内容。当然，政府也学会了挑拨工人对抗学生，直至后来出现了团结工会。

西方世界又如何呢？美国民权运动之初，黑人学生采取每天静坐“霸座”的方式抗议餐馆不为他们服务的态度。伯克利的白人学生到南方州鼓动黑人登记投票，敲门时总是两人一组，以获取信任。为了吸引电视台注意，非暴力运动被打扮得花枝招展，故意招惹警察的攻击。而到了反越战阶段，诗歌、音乐、海报、大麻、做爱被用于集会宣传，前往古巴声援卡斯特罗甚至成为时髦。在大学里，要求男女生同校同宿成为法国学运的起爆点；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则发展出占据大楼的运动，还有牧师在被“解放”的大楼里为革命情侣主持婚礼。

运动“指南”之外，本书还融合了诸多当年的历史性事件，如“埃塔”和“巴解”的恐怖主义尝试，刚果的比夫拉战争，“阿波罗 8 号”载人飞月，尼克松凭借对种族主义具吸引力的“州权”和“法律与秩序”概念重组共和党，等等。这不是首本以单一年份棱镜串起全球化事件的著作，但在我看来，其可读性远在得到出版界推崇的《1968 年的全球史》之上。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美】马克·科兰斯基 著 程洪波 陈晓 译 黄原竞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 10 月版

⑨

为什么选举是不公平的？

文/田磊



美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最热衷于投票游戏的一个集体。他们喜欢用选票来评价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社交网站上网友们的相貌等等，投票已经是流行文化天然的组成部分。当然，最重要的投票游戏还是在政治活动中。

正因为这些无处不在的投票，美国人对投票理论的研究也高度发达，几百年来，理论家们一直都在为寻找一个能够准确衡量选民愿望的公平方式而争论不休，他们的争吵通常要用到大量的数学和逻辑学模型，也就使得一般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奥妙。

美国作家威廉·庞德斯通写了本书《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分析美国现行多数投票制存在的弊端以及曾经造成的荒谬结构入手，对历史上曾经运用的、几百年间学者们提出的、乃至近些年互联网盛行的种种投票方式，进行了详细探讨。

在庞德斯通看来，美国现行的多数投票制最大的漏洞在于选票分散，这种漏洞被那些精明的竞选顾问们洞悉并加以利用，诸如炮制出“搅局者”来分散对手的选票等等。这也造成了至少在 5 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最终并非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当选总统，至于在各个州长、议员等选举中出现的次数更是不胜枚举。

选票分散的例子体现了政治冷酷的一面，不过它也同样是人们利用逻辑学来改善世界的一种尝试，尽管很少能起作用。更糟糕的是，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早就用他的不可能性理论从逻辑上证明了：选票分散及由此引起的恶果会破坏几乎任何合理的投票方法，没有哪种投票选举制度是完美的。

几十年来，理论家们一直试图推翻阿罗的不可能性理论，却一无所获。而在现实政治中，那些有着超人智慧的竞选顾问们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像兰德公司和克里姆林宫里的“冷战斗士”一样残酷无情，他们充分地挖掘和利用人们的偏见、自私、无知、冷漠以及攻击性等等负面情绪。

这听起来简直是让人绝望的。理想的民主政体怎么会被这样一些恼人的逻辑学定理所困扰呢？美国人修补漏洞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庞德斯通揭露真实政治制度的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寻求解决之道。在他看来，“计分投票制”（投票者在 0 到 10 或任何其他规定的数字范围内，为候选人评分，得到最高分的人获胜）是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这种制度早已广泛应用于网上调查等各种社会生活中，但却极少在公共选举中使用。没有人能确定投票方式一旦发生变化，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作为个体，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纠正现代社会中某些固有的缺陷，而那些能够操纵选举的精英理论家们，一直都自信地认为，他们比选民更清楚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他们更明白，与相对见效较快的多数投票制相比，在灵魂深处说服选民，改变他们的观念，就如同冰河的流动一样缓慢。对于那些擅长政治表演的人而言，现有制度要比一种更能准确反映选民意愿的制度更令人满意。

于是，改变也就变得异常艰难。就如哲学家哀叹过的那样，人类不论想出什么样的制度来约束自己，以示公正，他们中那一小部分在智力上超出大众者总能很快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击垮制度，放纵自己的私欲和贪婪。

《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

【美】威廉·庞德斯通 著 刘国伟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版

⑩

入门级的海权演绎史

文/谢奕秋



人类“争洋霸海”的历史并不像我们对于陆地的统治那样源远流长，尽管约公元前 12 世纪初的特洛伊战争中，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城邦就派出了上千艘远征舰船，但那还不属于海战，充其量是一方面利用海洋运兵。有史记载的最早的海洋争霸，发生在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和迦太基之间，而公元前 4 世纪初（相当于孔子晚年）的

3 次希腊——波斯战争，则是历史记载甚详的海上争霸史。后来有了《争洋霸海》这本通俗演义，你可以说它不学术，却无法说它不好看。

即便是对古代文明和战争时空背景一头雾水者，也能以一种轻松的心态阅读本书，因为作者以故事情节带动历史细节的叙述笔法不同于那些引经据典的历史大部头。如果非要理个路线图当书签，这里可以简述一下：希波战争攻守易位之后，雅典组建了海上同盟，与陆军强大的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着干，双方打了 27 年，最终财政紧张的雅典投降，而包括斯巴达在内整个希腊城邦也走向衰落，不久后被马其顿人征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利用希腊人征讨拥有腓尼基舰队的波斯，所向披靡，最后亚历山大因病身死国灭。这一阶段，因海军缺乏高利润国际贸易的支持，陆权相对海权仍占突出位置，舰队本身不足以卫护陆疆。

亚历山大帝国覆灭数十年后，在地中海北南两岸，罗马人又与西北非的迦太基人打了两次布匿战争，双方互派舰队登陆对方领地，并在海上决战。迦太基人一度靠汉尼拔长途跋涉的陆战反败为胜，但最终不敌人才辈出的罗马帝国，完全交出地中海制海权，成全了后来吞并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罗马帝国。及至罗马帝国分裂，北方蛮族入侵西罗马，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又靠首都要塞支撑了 1000 多年，先击败了“第二波斯帝国”，后又靠“海洋之火”秘密武器屡次击退围城的阿拉伯舰队。这一阶段，前期陆权优先，但罗马也扩张了海权，用于对外征服；后期，则局部是海权优先，拜占庭俨然已有大英帝国那样的地缘优势。

难得的是，本书还写到北欧的诺曼人（日耳曼人一支）在地中海西西里岛的异军突起，这个王国一度俘虏了教皇，控制了南意大利和西北非，还东征拜占庭，最后因出师不利被迫将公主嫁给神圣罗马帝国未来的皇帝，以致神圣罗马帝国后来统治了南意大利。而北意大利两翼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则在诺曼人退出后争霸地中海，这可谓真正海权独大时代的到来。

接下来就到了大航海时代，而之后的历史在《大国崛起》中已被重点解读，但本书综合运用海权、商贸、军事思维，条分缕析的解读，传记式的写法，尤胜一筹。虽然这部多依靠编撰的杂糅之作有不少缺点，但读它你会爱不释手，而不像啃教科书那样畏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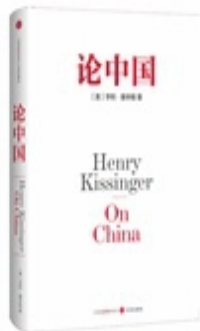
《争洋霸海》

文天尧 著 凤凰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⑪

基辛格诠释的中国外交

文/谢奕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的《论中国》中译本，头尾有点闷，大概是因为分别写古代中国世界观和 21 世纪中美关系的缘故，而主体部分分析描述的中国对外几场战争的决策思路及中美苏三角博弈的过程，却因为作者的研究偏好及亲身参与而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称号绝非虚授，基辛格谈及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是赞赏有加。他不时臧否美国前后任政府的政策，却尽可能为中国的出格举动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同时，他不是汉学家，用不着掉书袋，所

以，你能从他删繁就简的行文中读出历史的脉络感。他引用沈志华、杨奎松等中国学者的研究，并关注胡鞍钢、刘明福等体制中人的言论，足以说明他对中国学界并不陌生。如果说略有意外，那就是他对恭亲王、李鸿章等晚清外交官的同情论调，有着很强的设身处地感。与此同时，他不吝笔墨地勾画中国皇帝“治夷”的种种小计谋，并将之代入毛泽东对付苏联的招术或自己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所受的恩宠，从而把外交史写得像章回小说。

严格说来，《论中国》并非研究中国的专著，而是基辛格根据切身体会，带有拼盘色彩的随性之作。他对中国当代政局演变的粗线条概括，只是为了给他醉心的大外交作铺垫。而在大外交框架内，他对朝鲜战争、中印战争的动机解读极具开创性，且将之纳入中国式先发制人心理威慑的理论范畴。对于早年的台海危机、中苏论战，他大肆渲染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而对中美关系在此期间的停滞和“文革”的灾难性影响只是一笔带过。

理解伟人，信奉英雄造时势，是基辛格性格里一以贯之的东西。作为出生在魏玛德国的犹太人，他少年时幸运地躲过了希特勒的迫害，移居美国，后来又参加了美国陆军，开进德国。据说，他至少有 13 个亲戚被送进了纳粹毒气室，但他所应用的均势理论却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推崇现实主义外交。他的哲学思想深受《西方的没落》作者、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影响，命定论色彩浓厚，但同时他又被美国梦激励着，崇尚伟人创造历史。他本人通过谈判结束了越战，并为此获得诺贝尔奖（获奖是在他秘密访华、打开中国大门两年后）。

基辛格被中国人记住，是因为他敏锐察觉到 1970 年代初中国的战略处境恶化，而不顾中国的意识形态“空炮”，最先向北京伸出了友谊之手。他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之间立场的差别，却以局外人身份超脱于这些当时他还理解不深的利害关系之外。《论中国》详述了中方要求美国积极遏制苏联的措词，以及在这种愿望遇挫后的抱怨情绪。书中也梳理了中国外交方针从“一条线”反苏到“三个世界”理论的演变，并鼓励中方继续冷处理台湾问题。

书中还露出基辛格难得的自省意识。他后悔陪福特总统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见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认为是“失策”之举，没能照顾到中国的情绪。

当然，本书最大的卖点，是基辛格博士与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的交往实录，以及对那些领导人在历史关键期各自不同表现的评价。这一去神秘化的努力没有在翻译出版过程中遭到过多的刁难，这应该是中国读者的幸运，也是中国外交学界追赶世界一流水准的契机。

《论中国》

【美】亨利·基辛格 著 胡立平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版

⑫

当“王二”遇上经济学

文/刑少文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虽然是一件让人讨厌的事情，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却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现实世界千差万别，不断变化，无法只用一套理论去解释。

从经济学著作中去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这两种倾向都存在，要么弄一堆枯燥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让人看得很头痛，却也没有推导出什么新的经济学思想；要么将中国经济问题简单化，未经严谨的逻辑分析妄下结论，或直接套以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并

了事。

也因此，在市场上，除了那些似是而非的阴谋论和得不偿失的盛世论、末世论之外，有趣味，贴近实际，浅显易懂同时又有严谨的学术逻辑支撑的经济类畅销书是很稀有的。

在后者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郭凯著的《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可以算一本。书名便可知，它其实不是一本经济学研究著作，只能算一本经济学读物。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人物，郭凯借用，将其当作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代表性主体”，以王二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为一个切面，从故事化延伸解读一系列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如收入分配、房价、税收、外汇储备、汇率、中国模式、民粹主义等等。如此表述，用作者的话说，是尝试将经济学模型文字化。

这种类型的表达方式在阅读上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些讨巧的成分，但和王小波的杂文及随笔一样，这本著作也意图给人提供一种“思维的乐趣”，有趣、有味，有一些思考的启发，也就足够了。

当然，有时候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事实、逻辑和理念的推导是有问题的，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他所言：“讲故事的最大问题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误解：你可以随意编一个故事，来证明一个歪理。”不过，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视野可以使作者尽量避免这一点。

王二施粥、卖粮、卖西瓜、吃肉、当地主、开公司、当村长、养生、罢工等等，其中的逻辑，牵涉的是经济学中的一系列经典理论阐述和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

对于知识与立场的审慎，也是此书受笔者喜欢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市场经济在中国席卷一切，也因此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解释边界无限，但显然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方式是不能够包办一切的。在这方面，作者保持了一种节制和开放的势态。

比如，在通过王二施粥的故事来讨论如何解决春运火车票难的问题时，针对一部分人根据经济学的供需理论来提出火车票提价、“价高者得”的解决方案时，作者指出，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第二，如果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是穷人？因此，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

而在分配问题上，“即使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必是社会选择意义上最优的分配。”“市场即使是完美的，其分配的结果却未必完美。”

诸如此类，读者可细读之。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郭凯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版

⑬

为故乡立书

文/白小陈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为故乡写一本书，问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的抱负，“以故乡村庄为起点，多条线索并进，从各个侧面重新梳理了百余年来中国史与乡村

史”。而书中浓郁的乡愁，不经意间肆意流淌，但在作者笔下，这种乡愁不是简单的对过去的怀念与流连，更包含着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准确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乡愁。

在序言里，作者借农学家董时进之口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不是一部通过表格获取所谓学术价值或者时代真相的书。在作者看来，这种写作方式可能能够得到一个答案，但它有可能更像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产品，既不能走进时代与心灵，也难得有真知灼见，因为填写表格的人，可能隐藏了内心，他们的生活被省略成几个选项。也是这个原因，作者希望能够结合自己的幼年经验，以一个介乎城乡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游子身份，回到曾经熟悉的本乡本土去观察。从微观层面，它需要关乎农民生活的精确记录，与此同时，不可或缺的是大历史背景下的宏观视野。一如作者所说，为故乡立书更要“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

对于作者来说，《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写作上的一种尝试。评论家张柠认为这是“从土地疤痕深处迸出的文字”，而体现在该书中的文字和写作风格，“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稀罕物”。熊培云没有和小说家比拼讲故事的叙事与结构，也没有和书斋里的学者比拼建构一个逻辑体系和归纳一些概念，他的文字的价值在于他对“为何写作”这一基本的、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有十分自觉地意识。与此同时，他将作家与知识分子这两种思维方式，将“非虚构”与“虚构”这两种写作方式，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性思考，感性表达”。

作者针对不同问题而选择不同文本，同样是对“跨文体”写作的有益尝试，以至于读者无法用传统的文体概念去为之命名。这里有充满想象的抒情性文字，这是作者情绪的流露；有“历史考据”，主要是呈现近 100 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史和问题史；有鲜活的“口述历史”，这是对被历史删除的当代乡土遭遇史和故乡颓败史的补充性陈述；有“乡土社会学”论述，包括对被遗忘的社会学家（董时进）的介绍，对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生育制度、乡村民主的考察。而且这些文字有很强的文学性，或者说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材料做支撑，使得那些感觉上非常理性、非常抽象的问题，变得具像而可感。

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所获得的各种年度图书奖项中，《看历史》杂志将其归类于年度历史图书，《文学报》将其归类于年度文学图书，而《亚洲周刊》则将其归类于年度非虚构作品。正如作者所说，今天的小说家们在现实面前输掉了想象力。这个时代，每一种苦难都真实得掷地有声，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虚构的。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版

⑭

“中国崛起”的文化使命

文/张慧瑜



《文明·国家·大学》是学者甘阳近些年会议发言、媒体采访、大学讲座及讲稿的合集，这部厚达 500 多页的“巨著”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说”出来的，带有强烈的现场感和时代感。甘阳敏锐地感触到这 10 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并试图提出从文明重建的角度来回应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在《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导论中，甘

阳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要有“文明——国家”的自觉和野心，而不应安于成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恐怕比作为大国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新的官方话语更加大胆和超前。在甘阳看来，比经济崛起更重要的是理解并重建中华文明的自信。

甘阳喜欢用带有主体性的“中国道路”，而不是“中国经验”来描述当下中国的崛起。他认为中国道路并非只是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 2011 年入世所标识的积极加入全球化体系的结果，而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传统、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平等传统和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自有传统的相互融合的产物，这就是所谓的新“通三统”。这种把中国作为“历史文明连续体”的论述改变了 8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作为彼此断裂和否定的想象，成为对后冷战时代/90 年代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中国版回声。尽管甘阳对这三种传统的“蒙太奇”剪辑有着更加复杂的理解——三种传统如“三权分立”般彼此制约才能形成最稳定、和谐的宪政结构，但是很多人依然从中嗅出了用孔夫子的传统化约束其他两个传统的“企图”。不过，这种对中国传统或中国文明更加自信和肯定的认识，确实是新世纪以来才浮现出来的文化想象。

从书中可以看出，甘阳提出了超越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内在分裂（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之后的第三条道路，或者说一种兼顾平等与自由又具有独特文明价值观的文化保守主义之路。于是，“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对美国模式的迷信”的出路就是回到对中国古典/文明价值的理解和认同。正如 80 年代的甘阳借助“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丛书推动彼时的新启蒙文化运动，而此时甘阳则通过在重点大学（中大、复旦、清华、北大等）“亲历亲为”推广通识教育来落实中国文明重建的工作。虽然从“精英中的精英”所开始的通识教育究竟能对未来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这种“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或“知行合一”的勇气在当下学术生态中也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重提/重建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共同体”的普世价值是为了反思西方现代性所遭遇的困窘（如陷入金融危机泥潭中的欧美社会），那么中国崛起究竟是全球化播散的新的中继站，还是真的能带来与现代资本主义不一样的价值空间，这依然是观察当下中国不得不面对的诱惑，抑或陷阱。

《文明·国家·大学》

甘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1 月版

⑮

中国经济黑皮书

文/石勇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上帝的容颜/是否曾在阴云密布的门厅中显现？/耶路撒冷/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来？”

这首诗，曾被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在《资本主义黑皮书》一书中，引用来形容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工厂噩梦”，以及当初“野蛮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工人普遍陷入权利和物质的贫困，任由资本家在宰割，甚至孩子、残疾人也被驱进“血汗工厂”。

这一成功，用中国独立评论人袁剑在新书《大拐点》里的语言说，就是，资本家做到了把成本“社会化”，自己摘果子，

但烂摊子砸给别人。

袁剑并不是对几百年前的欧洲发言。那已经是一件历史往事。在今天，有赖于民主制度的驯化，以及权利王牌的确立，当初折磨欧洲的那些噩梦早已消失。

但另一个大麻烦正在纠缠今天的中国，并日益显得像个噩梦。《大拐点》正是要揭示这个大麻烦的形成和实质。和那些肤浅地赞美中国经济的经济学读物相比，这是一本指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个模式有如厝火积薪的政治-经济惊险读物。

从 1992 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令世界惊叹。2010 年，GDP 为 58786 亿美元，超越日本，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这种“崛起”，使它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有江湖地位。这是过去百年来从未有过的。

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两个看似明显矛盾的现象。一个现象是富人越来越富，官企利润丰厚，政府财政收入大涨；另一个现象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普通人的被剥夺感越来越严重。

如何解释中国经济为何能持续高增长，以及高增长下这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呢？

袁剑的解释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

所以，从逻辑上说，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是一个逻辑上不可持续的游戏：“社会”总有不能承受这种成本的时候，弱势群体也总有无法再容忍被剥夺的那一天。根据自己的观察，袁剑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大拐点”，玩不下去了，2008 年后，即已是一个明显的“断裂”。这一点，倒是和高层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调，以及社会冲突越来越多暗合。

然而这只是一个规律、趋势。就像大家都知道，玩得这么疯狂，房地产市场迟早得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可我们实际上永远不知道，以权力来支撑的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潜能到底有多大，而社会能够承受成本的底线是什么。

所以，如果非要给经济的“崩盘”划一条时间线，作出预言，并不排除会有落空的可能性。袁剑在 2010 年说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而且 10 年房地产牛市即将结束，事实证明，他这样说只是在趋势的意义上才成立，还是太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到 2012 年的 7 月，房地产仍然这么坚挺。

《大拐点》

袁剑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

16

中国政改的争鸣与共识

文/李克诚



几乎每个几年，特别是当执政党全国党代会召开前后，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便会迅速升温。政治改革是一项关涉所有人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但同时也是一项有着高度技术性的专业工程，因此，那些专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身处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之中的政治学人，其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结合而得的观察，便有了独特的价值，值得人们倾听。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广斌与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寇见闻联合主编的《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一书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集合了几十位优秀政治学人求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议题涉及民主政治、政经关系、人大制度、“利益集团”等中国政治变革的方方面面。其丰富性实际上也反映出当前对于中国政改该“如何办”的另一种表征——在具体路径上，存在着分歧和争鸣；但在很多话题上（如对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推进）则存在着广泛的共识。

在学术的视野中，政治并不总是权谋机变、利益交换之类不那么美好的面貌，在政治学的源流中一直以来也都不缺少对观念、信仰这些价值的考察和追求，所以，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理想政治家总是被人们期盼，在这些专业研究者的思维中，也不例外。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尽管，“观念在具体的利益面前有时会显得疲软”，但学者仍期望，“那些掌握重要权力并有坚定信念的人”会“冲破利益之网的阻力”。

当然，政治学最重要的价值仍旧是路径层面的考察。以本书为利，高全喜教授梳理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五种模式的可能走向；中央编译局的何增科总结了学术界有关中国转型的几种观点。中国社科院于建嵘从政治现实主义和操作层面提出，中国政治的理想目标和方向是民主和宪政，但眼下最现实的目标则应是“法治式威权政治”。法治秩序在中国转型中的优先性，也被其他学者所强调。

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民主，如何发展“中国式民主”？不少学者共同提出了应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切入点。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颇有启发性。

持续 30 多年之久的市场经济给中国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关系也带来了很大变化。以“分权”、“放权”为主要路径的中国改革模式，在提高了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的“部门化”和“地方化”。如今，众人均感叹“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是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的最重要因素，而学者的研究却发现，正是改革本身催生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并非是要重回到过去的体制，而是要打破这一僵局，必须深入推进系统的改革，而非单兵突破地尝试。这也给我们带来另一个启发：改革并非是全好或全坏的单面事物，它是积极和消极、进步与退步并存的复合体，其中正反效应、多种机制相互交织、共生共成。因此，对于改革，绝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一定要区分具体领域和具体影响。这种对改革的负责理解，将促使我们寻找一种更加综合的改革战略。这种“综合改革观”在今天尤为重要，也是 30 多年改革的最大的思想遗产。

《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利益》

杨光斌 寇建文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 月版

17

最好的《酒国》

文/何蕴琪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如果莫言没有在 201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创作生涯中这部唯一“自谓不凡”（见莫言《酒后絮语》，1992 年）的长篇小说，也许将一直游离在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外，不会有再版的机会。这部写于 20 年前的作品，对今日中国现实的批判力度和深度，让人震惊。它也无声回应了对莫言的许多诟病，比如他在政治立场上的“乡愿”姿态，

比如他对暴力和性近乎沉溺的美学依赖，比如他对语言实验的过分崇拜——尽管这些诟病在针对他的其他一些小说时，并非毫无根据。耐人寻味的是，以上特点在莫言某些小说中可能如野马奔腾，但当它统一在《酒国》特殊的结构和主题中时，却被驯服得当、各归其位。

《酒国》提供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主线讲述省检察院特级侦查员“丁钩儿”深入酒国市调查官员吃婴案件过程，另一条线索则呈现酒国酿酒学博士、文学爱好者“李一斗”与知名作家“莫言”多次往来通信。

在交替进行的两条主线中，一边是“丁钩儿”屡战屡败地试图深入酒国真相，其中他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在酒桌上的“交战”最为骇人，莫言最为人所认识的“新感觉派”技巧在描写酒精对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乃至一个国家政治肌理的腐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力；一边是“李一斗”一篇篇大醉写就、语无伦次的通信和小说习作，在这些“习作”中，吃婴秘密渐次展露，同时莫言将鲁迅小说笔法、“大字报腔”、武侠腔、志怪小说写法——拿来戏仿，将符号化的酒国市民“李一斗”所能达到的疯狂程度——也是一国国民所能达到的疯狂程度——呈现得淋漓尽致。

酒席后，“丁钩儿”始终分不清自己被半蒙半骗吃下的“红烧男孩”是食物还是人，陷入精神煎熬中，继而沦陷在“金刚钻”情妇的温柔乡里，更因情杀沦为通缉犯，而他最终的结局，则是在亡命途中掉到粪坑里，呜呼哀哉。另一边厢，一直在通信中“道貌岸然”的作家“莫言”最终听从“李一斗”的建议，坐上前往酒国市的火车，并如同死去的“丁钩儿”般，落座于“金刚钻”的酒席。小说就此煞尾，留下的却是极具反思意味的省略号。

莫言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宏大”主题——中国政治与国民性（从结尾来看，他也把这样的批判指向了作为作家的自己）。毫无疑问，鲁迅关于“吃人”的主题在这里获得了继承，以及创造——“五四”传统谈论的是“礼教吃人”，而在《酒国》，到底是“官吃人”、“酒吃人”还是“人性吃人”，莫衷一是。作为在 1980 年代经历与西方文化重新接壤的“先锋派作家”莫言，所承接的还包括比“五四”传统以更“复杂”的方式看待政治和人性的现代主义传统。这种复杂性本质上是内生的。“五四”一代认为，推翻了“礼教”就可得救，而弥漫《酒国》通篇的与其说是革命性的“推倒”精神，还不如说是一种对人性、对制度的存在主义式的失望。在《酒国》开篇，“丁钩儿”搭便车入酒国的过程，其渲染得神秘、隔绝、恐惧的气氛宛若卡夫卡批判性最深的《城堡》开篇。如同卡夫卡永远进入不了城堡，“丁钩儿”，甚至是读者，永远都进入不了酒国的真相。直到结尾，吃婴真相都没有得到揭示——也许对“酒国”而言，谜底不重要，只有“酒席”是永恒的。

《酒国》

莫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

⑱

奇迹，而非神迹

文/王晶翀



这本诗集是“观察的诗歌”，而非“介入的诗歌”：它并非行动并且呼吁行动。在这一点上，《奇迹集》与上世纪 90 年代以降的诗歌主流倾向相呼应。欧阳江河曾写道：“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

的成分。”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欧阳江河提出了“具有本土特征的个人诗歌”的写作策略，把身份定位于“诗人中的知识分子”，并最终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是一群词语造就的亡灵”。在这样的魔咒下，诗人的写作变成了词语的炼金术。当然，与其说欧阳江河是一个虔诚的传道者，不如说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当代诗歌并非沿着他分开的红海大步前进，而是靠着他发现的一条秘径曲折行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奇迹集》的写作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在写作的起点上，它仍然是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但是在写作的终点上，却呈现出了与当代诗歌完全不同的质地：它纯净、透明而又广大、包容。首先是一种全新的诗歌语言的策略，令它焕然一新。例如在《母子图》中，完全是散文式的描写，甚至与一般的诗歌截然背离，连续使用“高大、健康、英俊”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一位少年，用“漂亮、美丽、迷人、性感”来描述他的母亲，单独抽取任何一个句子，都几乎毫无诗意的锤炼，但正是这极少——作者极少添加的诗意，却包容了极多——读者对生活的感悟。它召唤读者，不是用智力去解读作者的微言大义，而是自己去体悟。艾青曾提出“诗的散文美”：“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也是那么新鲜而单纯。”在《奇迹集》里，作者的语言并不新鲜，然而单纯；并不生活，然而易懂。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看做是报章杂志式的语言。同样，作者在诗歌的技术上与其说在追求高度，不如说是在追求低度。但这低度正是要凸显出诗歌对象的高度，从而完成对于诗歌主体的镜像式的复现。

回到主体——这一主体正是被诅咒的旁观者，他有观察的意愿而无介入的意愿（“既然是这样/那它就是这样”《既然是这样，那就是这样》），或者他有介入的意愿而无介入的能力（“我也很多话要跟他说/关于他的孤独/但我却不能”《坐在下午的大街上》），他观察却不能了解（“我希望她不是因为亲人去世/或就要被那男人抛弃/而只是因为生活的郁闷”《哭》），或者他了解着却又被差异隔绝着（“但请不要再走近一步/否则我会惊逃/请一定不要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们立即就会变成陌生人/真正的陌生人”《陌生人》）。于是，“我”以一种“空”的姿态旁观着、爱着（“而当你是空的，整个地/永远地空着，想想，那是怎样一个世界/你会爱一切”《空》）。与此同时，“我”仍然希望“我将不用歌颂人/而做我所歌颂的人”（《来生》）。也许，对世界的歌颂之热切，不过是与世界的隔绝之深彻的反映。

《奇迹集》

黄灿然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9 月版

①9

“文学候鸟”的人性观察

文/丁杨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从 1997 年至今，每当过了春节，天气转暖，在天津塘沽家里的杨显惠就像候鸟似地开始准备前往甘肃的行囊。或者三五个月，也许更长，他和当地人同吃同住，行走、采访、搜集资料，为下一步的写作积蓄力量。

很难说他这些年“往西去——回天津——写作——往西去”的轨迹是出自一位作家对写作的敬畏、对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的责任感，还是他的文学“生物钟”使然。他是兰州人，

上世纪 80 年代才随妻子定居天津，他的写作始终围绕着“甘肃”题材，从《夹边沟记事》到《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都是发生在中国西北这片土地上的事情。《甘南纪事》也是如此，甘南藏区农牧民的喜怒哀乐在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的细节，以及作者对当地人、信仰与是非的观察和思考。

《甘南纪事》与杨显惠的两部前作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故事的发生时间集中在近年，人物大多为藏族农牧民，还在于作者讲述这些故事的态度，节奏乃至文字背后的情感，都要更平和，从容，即使仍有悲悯，也融在文字里不易察觉。而他广为人知的《夹边沟记事》里对特殊年代那群被流放西北荒凉之地的右派分子的遭遇有着冷静至残酷的刻画，《定西孤儿院纪事》则将笔调聚集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三年饥荒时期那群与贫穷、饥饿为伍的孩子们的命运上，两本书都真实、具体得像纪录片般，其中对人性的拷问与对人物命运的扼腕有着冲击人心的大悲恸。

据杨显惠自己说，这本看似轻松一些的《甘南纪事》写起来并不比他另两部作品更容易。毕竟以外族人身份深入藏区，对藏民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不熟悉，更不要说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巨大，这些都使得他们的写作从筹备期就显得谨慎、缓慢。但出于“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甘南纪事》“后记”）的考虑，年事已高、健康也偶有问题的他还是上路了，那些当地的高海拔和艰苦的生活状态也不会阻挡他的热情。这些辛苦最终得以在书中呈现，我们看到他用平实、质朴的语言，不紧不慢的进度，将他眼中、心中的甘南娓娓道出。故事是真实的，真实到某些情节都有据可查，这个特点也是杨显惠写作以来一贯的坚持，但他仍用文学笔法来承载这些真实。当然这其中包含素材的取舍，甚至会把几个人的经历放在书中一个人物的身上。不过这并未冲淡这部作品的“纪实”意味。藏族农牧民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价值观、是非判断，这些传承千百年的精神元素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外面世界的冲击，特别是飞速发展的外部社会与无处不在的经济洪流的冲击。这之间的失衡、矛盾是该书耐人寻味之处。

杨显惠更多是在讲述、陈列，而不急于评价、省思，他更愿意让文学自己讲故事，让读者自己品味字里字外的深意。

《甘南纪事》

杨显惠 著 花城出版社 2011 年 9 月版

②

悲歌当泣刘氏女

文/何蕴琪



“刀斜插进去，要快，进去就要点心。点到心，猪就死了。”

杀猪、分肉、收尸、抬棺，开篇两节以寥寥数个片段，简素、克制的白描，将性格各异的女囚音容描摹净尽，监狱气氛由此氤氲得触目惊心。此时，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与主角“刘月影”皆已登场，懵然不觉的只是读者们，在众多名字中辨认着她们的身影和身份。只是，这些描写中有幽默，有温情，可供后来悲歌响彻时再回味。

第三节，镜头拉近，“说书人”即叙事者“我”，终于与杀人犯“刘月影”展开对谈，煮红茶，讲故事。而故事仍未开始。

第四节，“我”终于开讲——哪怕在这种时候，作者仍能给你一个半拍的休止符：“苍穹高渺，星光闪耀，很静了。我把纸放周正，钢笔捏在手里。刘月影开始了漫长的讲述……”在两人的交谈中，以直接引语出现的刘氏自叙，娓娓道出其婚姻经历和“杀人动机”。直到此时，如同惊悚片中剧情过半而“戏王”迟迟未启，读者早被明示暗示挑起的期待屡屡搁浅，心脏似被轻轻拎起悬挂在作者笔尖，震颤不已。

直到推进至第五节，“我”始将所听到的事件经过和盘托出，当然，“案情”之挑战阅读极限，证实先前的铺垫笔墨俱无浪费，其直捣读者的心脏，快狠准不输“点猪心”的刀，而叙事者冷静的笔法，让这种感觉来得更猛烈一些。

小说过半，高潮似已揭幕，但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开头——假如停在这里，小说就真如出版人言，仅叙“美丽女囚狱中情罪”。接下来的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节，围绕“刘月影”的狱中生涯，渐次展开更丰富的叙事层次。“抖屎”一段，略叙“钱袋”经历“穆干事”羞辱，一年后纵火报复一事，虽只作为“刘月影”救人减刑的背景表述，却将那个时代的历史底色渲染无遗。“刘月影”爱子心切，却遭遇亲生子嫌弃；重获爱情，未想仍以失望告终。最后的煞尾并未特别，似悲歌之余音。唯白描细节动人，为儿子做鞋，“从搜集布片开始，袷襻自己打，麻绳自己搓”的刘氏女，因等候情人而“低下头，像少女一样羞涩”的刘氏女，始终荡气回肠。

从结构而言，小说具有古典戏曲般的叙事能量，曲折蕴藉，却在看似迂回的表述中爆发。同时，锋芒渐露的悬念，因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者而达到的克制，也是小说值得一提的地方。

章诒和女士以 10 年牢狱生涯，30 年隐忍酝酿，将“内心的恐惧”（见《刘氏女》别册作者访谈）以虚构文本倾泻而出。对待一份这样独特这样沉重的“发言”，仅仅注目于它的写作技巧和阅读体验，几乎可以说是“不道德”的，但另一种意义上说，它的批判力度，也正是通过同样独特的语言、叙事节奏和小说结构去达成。不论章女士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她的文本给众多“文革”叙事增添了一个宝贵的声音，不在乎对象是“女囚”，也不在乎事件的“奇情”、“凶杀”，而在乎故事中对人性呈现的力度、深度和温度。

《刘氏女》

章诒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编辑